



孟子之心论

□夏海

心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范畴，其名言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孟子关注心的范畴，建构了比较完善的心论，使心成为传统文化的关键词和基本概念，深远地影响了宋朝理学和明朝心学。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对于修身养性和塑造良好人格，进而治平天下，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心是前提

没有本心，就没有孟子的心论。类似的概念还有一个是良心，“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良心与本心是同一概念，可以互通互换。在孟子看来，本心是人所固有的仁义礼智四心，“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朱熹注曰：“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本心是一种善的存在，具有道德情感指向，发而为情为性。人心本善，自然表现为人性本善，本心和性善一体两面，合二为一。

孟子举例从两个方面说明本心和性善与生俱来，对于儿童而言，是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对于成人而言，是惻隐之心。所谓惻隐之心，是成年人在儿童将要掉入井里的紧迫情境中，自然而然、情不自禁产生的心理情感，“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既使人性本善在形而上层面得到验证，也说明在“四心”中，惻隐之心是根本；在仁义礼智中，仁具有更基础的地位。孟子最担忧的是人会失去本心。这就像有的人为了住上华丽的住宅，为了有娇妻美妾的侍奉，为了得到贫穷和困乏者的恭维，而不辨礼义地接受了往昔怎么也不肯接受的万钟之禄，以致失去了本心，“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存心是关键

人心本善，孩提阶段的心是善的。人生却不能停留在孩提阶段，而是不断地向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阶段成长演进。在成长演进过程中，任何人都经常会遇到物欲和功名利禄的诱惑。能否经受住诱惑，保持住本心，是任何人都要面临的大问题。在孟子看来，能保持住本心就是有德行的人，“大”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针对人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诱惑和烦恼，孟子提出了存心的观点，“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与一般人同时成长，却能够超越一般人，主要是因为君子能够存心，保持住本心。孟子认为，存心要养其大者。人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结合体，两者不可分割，大者指人的社会性，小者指人的自然性。存心不是要抛弃人的自然性，而是要先立人的社会性，存赤子之心和养仁义之心，“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

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同时，存心要求其放心。放心是失其本心和放其良心。对于人生修养而言，存心最大的隐患就是放心，孟子叹息：“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强调修身养性，就是要把丢失了的本心找回来、存起来，“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作为修身的实践途径，求其放心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找回丢失的本心和良心，回到心的本然状态，使之获得自觉的呈现，其内在的仁义礼智之人性才能有实践的基础和前提。

养心是方法

养心与存心密切相关，养心是为了存心，保持住善良的本性和赤子之心。在孟子看来，养心要寡欲。物欲有害于养心，功名利禄和感官欲望最容易侵蚀本心，“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寡欲不是禁欲，孟子承认“食色，性也”。食色等欲望不可能禁止，却可以减少，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朱熹对“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作出了明确界定：“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养心要养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心领气，气随心，互相配合，共同保持本心，“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养浩然之气，既要合乎正义和道德要求，又要发自内心的努力，持之以恒地坚守，“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养心要反求诸己。反求诸己，是指人生遇到挫折和困难的主要原因，在己不在人，在内不在外。化解挫折和克服困难的主动权，完全取决于主体自身的认识、行动和选择。反求诸己贯穿于孟子的全部思想，“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尤其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更要坚持反求诸己：“爱人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意思是，当遇到爱人时，别人不理解；管理别人时，别人不服管理；礼敬别人时，别人无动于衷，都要反过来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宜。只要自己行为端正了，别人自然会有回报。

尽心是目的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段话内涵丰富，内聚着心、性、天、命四个范畴，汇集了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修身、立命八个命题。其中，心是最重要的范畴，知性知天的基础是尽心；事天立命的前提是存心。

在孟子看来，尽心要成为君子。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也是尽心的首要目标。通过存心养心，塑造理想人格，使人的身体与心灵、言语与行为洋溢着性善的光芒，一见即知有大人之象，一望便看到君子之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尽心要扩而充之。人性本善只是道德萌芽，说明人存在着向善为善的基因和趋向，孟子称之为端，“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萌芽需要呵护和精心培育，才能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善性必须经过自我修养和扩而充之，才能发展成为完美的道德。自我修养是为了塑造君子人格，扩而充之则是在修习人格的基础上入孝出悌、治平天下，“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尽心要施行仁政。从本质上说，孟子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其心论也不例外。孟子坚持人性本善，说到底是为治平天下提供终极依据，“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尽心要无愧于心，“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无愧于天和人的关键在心，岐峻注云：“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无邪也。”

雨果有言：世界上最大的海，比海还要大的是天空，比天空还要大的是人心。这是对人心的礼赞，也是对人心的期盼。在现实生活中，人心之大、人性之善只是一种可能和倾向，能否由可能转变为现实，由倾向发展为大势，则取决于主体的选择和人自身的修养。孟子的心论在大声地告诉我们：追求人心之大，实现人性之善，非不能也，而在为也。



顺势之变

□崔庆

时势互变，应时而谋，乘势而上，不失点滴之机。秦统六合是中华历史的重大事件，有赖于主观努力，也离不开客观条件。秦自献公以后，牢牢抓住三次历史机会，不负大事因缘，砥砺前行，修成正果。

墨者入秦

秦墨有缘，墨家在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独特作用。惠文王待墨家首领巨子腹䵍如师，曾试图赦免腹䵍独子的罪行、为其留后。这在严法峻律的秦国是极其少见的，说明当时墨家在秦国备受重视。墨家何时入秦，未有确凿史料，学界也未有定论，但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循。

惠文王之前，孝公支持商鞅变法，其实是儒、法、墨汇流的重大成果。商鞅入秦后有不短的沉默期，得到秦孝公重视、朝堂论法之后，还有数年的蛰伏期。在似乎平静的日子里，商鞅一边深入调查了解秦国社会特点，一边设计变法总体方案、推演完善变法细节，法家之术融入了大量墨家元素。日后的什伍之制、推行县制都有墨家“尚同”的深深烙印，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国家成为秦不懈努力的目标。这说明在孝公之前，墨家对秦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

孝公之前，是开启秦国复兴之路的献公，有学者认为，献公极有可能就是将墨学西引入秦的原点，甚至他本人可能就是墨家的忠实拥趸。献公曾长期流亡魏国，当时魏强秦弱，家国受辱，

万般悲愤郁积在胸，时刻期待振兴长策。魏国是墨家传道的活跃区域，墨家的理念和实践高度契合秦国所需。献公经历坎坷、大器晚成，其不畏生死、执着坚韧的品行几乎是墨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苦行的写照。献公“止从死”是为墨家“节葬”，倡导县制是为墨家“尚同”，秦法赏罚分明，有如墨家是非之别。除了思想，墨家还给秦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技术流”，高超的工程技术和完备的防守体系刺激秦国军工体系脱胎换骨，“非攻”之攻催生了秦军防守反击的战法。

墨者入秦，墨学西传，为徘徊在低谷中的秦国注入蓬勃力量，扭转了秦国在与魏国长期对抗中的被动局面。秦墨相融，学之用之，又超然墨家之上，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一。

实有巴蜀

秦据关中，为形胜之地，秦有巴蜀，成从容之势。惠文王时代，秦占有巴蜀，并持续强化控制，是国力结构性升级的标志事件。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秦始终对于西南方向的巴蜀保持极大关注。自厉共公起，秦蜀开始交往，到惠文王已过百年，秦对于巴蜀之地的战略意义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秦惠文王继位的第一年，就组织对巴蜀进行全面侦察，还与蜀王“偶遇”汉中，后世有“石牛粪金”的传说，足见秦对巴蜀有持续渗透活动。秦如同一只潜伏的猎豹，始终等待吞

并巴蜀的最佳时机。

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苴相争，内斗不止，都向秦国求援，这是重大的历史性机遇。此时，秦国在东线经受了五国合纵攻秦的冲击波，艰难地取得了修鱼之战的胜利。即使压力巨大，但经过充分讨论，秦决策层统一了认识，将相同时出马，司马错、张仪共领精锐，挥师南下，乘势一举吞并了蜀、苴、巴三国。

巴蜀位于楚国上游，秦可以顺水而下，攻楚可以事半功倍。其次，巴蜀沃野千里，成都盆地和汉中盆地是两大“聚宝盆”，据之可富国强兵，却不影响山东各国在中原的既有利益，可谓“闷声发大财”。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秦得巴蜀，达到了广地、聚兵、得粮、制楚四重目标，下好了大国崛起的先手棋，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二。

五国伐齐

战国煮酒，秦、齐可共论英雄。楚、赵虽强，但秦在内心深处把齐视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齐、秦两国隔三晋而望，各自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和实力。

战国初期最先崛起的魏国，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两次败于齐国，实际上是败于齐、秦合谋，但这并不意味着齐、秦交好。三家分晋，齐、秦、楚三国鼎立，楚无大志，齐、秦暗中角力从未停止，从共克魏国到拉拢楚国，各自奇计百出。在齐、秦竞争的关键阶段，秦昭襄王和齐闵

谦逊和善的循吏

□石志刚

之风影响下，其子均学有所长、仕宦有位。他的小儿子刘歆继承刘向的学问传统，在六艺、诸子、诗赋、术数等方面均有建树。刘向对刘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为其取名也颇费了一番心思。《诗经·大雅·生民》中有一句

话：“履帝武敏歆”，其中“歆”是感动的意思。刘向希望刘歆能够作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刘歆也不负众望，少年得志，春风得意马蹄疾，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了黄门侍郎这一重要官职。为了助推刘歆更好地平稳发展，刘向写下了《诫子歆书》。刘向从有道德基础的人才能够得到福报这一立论高点进行阐释：“若未有异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然后，引经据典地加以说明，职位越高，越要保持谨慎态度，更何况职位一般呢？刘向谆谆告诫刘歆：“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朝，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刘向所提倡的“敬慎”理念在这篇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希望刘歆能够做一个“色思温、貌思恭、忿思难”的儒官。

当然，地位越高，态度越谦和，并不代表循吏没有原则据守。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了万历时期名臣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能够大胆荐赏在抗御蒙古战争中作战勇敢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之事。张居正对朝廷言：“成梁屡立战功，忠勇为一时冠，加以显秩，此鼓励将士之法也。”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朝廷封赏李成梁为宁远伯。不久之后，李成梁为了报答张居正的推荐之恩，派人给张居正赠送金钗，被张居正拒绝：“而主以百战得功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

皇帝也。”张居正地位虽高，但是没有丧失一定的原则，展示出应有的风采。

身份越尊，做事越低调

身份尊贵，有摆排场的资格，有炫富的条件，然而古代循吏能够定心持身，追求低调的行事风格，从严要求自己，在臣僚中树立起崇高的威信，显示出被后人称赞的为官品格。

古代循吏随着功勋的建立，身份越为尊贵，然而，做事却越为低调和善。北周将军达奚武在军旅，屡建奇功，在朝廷中身份越来越显得尊贵。他身居要职，却“不持威仪”“行常单马，左右止一两人而已”。他的朋友认为他这样做显示出将军的威严和排场，对他进行劝说：“公位冠群后，功名盖世，出入仪卫，须称具瞻，何轻率若是？”达奚武回答道：“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望里富贵，不可顿忘畴昔。且天下未平，国恩未报，安可过事威容乎。”出身布衣的达奚武能得到朝廷的赏识已经觉得非常荣幸，况且“天下未平”，自己没有更好地报效国恩，怎能计较个人的排场问题呢。

晋代的刘寔在年轻的时候非常贫穷，卖蓑衣以自给。等到他后来做了大官，“及位望通显也。”在张居正的提议下，朝廷封赏李成梁为宁远伯。不久之后，李成梁为了报答张居正的推荐之恩，派人给张居正赠送金钗，被张居正拒绝：“而主以百战得功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

王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齐闵王自恃强盛，刚愎自用，四面出击，虽然高歌猛进、风光无限，实则四面树敌、深种祸根。秦约齐东西称帝，齐灵机一动，乘机反秦。但齐为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三次用兵、灭亡宋国，举世震惊，成为众矢之的。高手过招，胜负往往就在电光石火瞬间。秦极其敏锐地抓住战机，暗中策动，不遗余力，促成五国联合伐齐。齐连年征战，外强中干，一触即溃，虽经田单复国，但大势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弱齐之后，秦逐步发力，强势攻楚，蚕食三晋，并将整体战略调整为“远交近攻”。远交的主要目的是持续稳定齐国，使其丧失对外扩张的斗志和动力。远交是近攻的基础，如果齐国依然强盛，秦无论攻伐楚国还是三晋，齐必施以援手，不仅“近不能取”，还会刺激齐国壮大。五国伐齐，秦顺势发力，此消彼长，山东诸侯皆无制秦之术，战国缓缓进入收官阶段，是为秦兴大事因缘之三。

悟者不惑，行者不移。机遇只会让有准备者产生共鸣，因缘的种子也只能在奋斗者的土壤中落地生根，矢志力行，方有所成。三大因缘，无一错过，天眷强秦，秦不负天。



正。”当时，石崇、王恺斗富，何曾日食万钱，身处当时那种社会氛围而不染，为当时政坛注入了强心剂。

资格越老，说话越客气

年纪、资历、阅历铸就的资格，会成为推进事业的强力剂，也会成为抱残守缺、阻碍发展的绊脚石。元代的史天泽因其兄死国事，代理其兄行使职权。然而，史天泽没有因为自己的长辈身份，而忘记引荐自己的侄子史楫，面见元太宗时说自己在暂行其兄之职权，“今楫已成人，乞解职受之”。史天泽不仅没有摆资格，而且还能主动让官，得到元太宗的赏识：“今之争官者多，让官者少，卿此举殊可嘉尚。”随后，元太宗分别授予史天泽和史楫不同的官职。

经历朝争祸患，隐居山中，待新主召见，始被重用，这样的人应该说是老资格了，然其言语措辞，稳妥审慎，令人尊敬。杜根就是这样的循吏。汉朝邓太后临朝的时候，杜根为郎中，向邓太后谏言让太子亲政，触怒邓太后，被邓太后处以极刑。非常幸运的是，杜根侥幸逃了出来，隐居山中15年。等到汉安帝亲政，杜根才被重用。有人问杜根，你的朋友也有好多，为什么15年中，你只隐居山中，而没有选择投奔亲友呢？杜根担心“祸及亲知”而忍于山中。平和的言辞，显示出他隐忍山中，只待国家昭雪，有机会能再次报效国家的决心。其言没有怨恨和激愤，忠诚之心可见一斑。